

蒙韩民间故事的影响比较

色 音

在蒙韩两个民族中流传着许多相同的民间故事。从比较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那些相同的故事中有些属于影响研究的范围,而有些则属于故事类型学的范围。本文拟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方法,对蒙韩两个民族间流传的相同的民间故事进行影响比较,企图探寻二者间互润的历史脉络。

一、《长脖子哥哥》与《长鼻子哥哥》

《长脖子哥哥》和《长鼻子哥哥》在蒙韩民间广为流传,并有很多的变异类型。韩民族中广为流传的《长鼻子哥哥》故事原型为《旁龟与弟弟》。赵成日先生认为早在公元6、7世纪时《旁龟和他的弟弟》这一故事就以童话形式开始流传^{〔1〕}。据韦旭升所著《朝鲜文学史》一书,《酉阳杂俎》、《东史纲目》都载有《旁龟与弟弟》这一传说。旁龟是新罗第一贵族金哥的远祖,他乞食为生。人们同情他,给了他一小块地。他就去向他的财主弟弟去借蚕子和稻种以便靠劳动维持生活。弟弟心术极坏,把蚕子与稻种蒸了以后给他。旁龟不知,照样拿了回去。蚕子竟变成了一条大蚕,不多几天就长得和牛一般大。弟弟嫉妒,就设法把蚕杀死,却意外地出现了更多的蚕,结了无数的茧子,缫出许多丝来。稻种子种下以后,长出来的稻穗有一尺多长。鸟衔了稻穗飞走。旁龟跟着追。追过五、六里到了山中,鸟钻进岩缝中不见了。旁龟就守在石缝旁直到天黑。忽然看见有一群小鬼来石缝旁玩耍。他们手中拿着一个金椎子。用金椎子向石上一敲,就出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群鬼敲出了酒、菜、饼等食品大吃一顿,吃完之后就把手中的金椎子往石缝中一插,扬长而去。旁龟于是把金椎子取到手,靠它发了家。

弟弟又羡慕又嫉妒,向哥哥问明原由以后,要求哥哥也用同样的方法给他蚕子和稻种。好心的哥哥不愿照弟弟的办法做,但弟弟坚持,旁龟只好照办。弟弟拿回蚕子,蚕子中出来的只不过是普通的蚕,稻种长出的也不过是普通的稻穗。弟弟守在穗旁,忽见一鸟衔穗飞去,他大喜追去,追到山中石缝旁,遇到了群鬼。群鬼把他狠揍一顿,命令他挖出三个池塘来。弟弟挖了三天,又疲乏又饥饿,没有挖好池塘。群鬼就拉他的鼻子,结果成了象鼻模样,长达一丈。弟弟回家后,受尽嘲笑,羞愧而死。

这一传说由新罗一直传入中国,由中国文人把它记录下来。唐代段成式所撰《酉阳杂俎》续集卷之一《支诺皋上》明确记载,《旁龟》故事为新罗国“第一贵族金哥”远祖的故事,并在故事的结尾加了“其后子孙戏击锥求狼粪,因雷震,锥失所在”⁽²⁾这一句。可见“丢失的金锥”这一故事母题来自新罗国时代的《旁龟》故事是毫无疑问的。张紫晨先生所著《中国民俗学史》一书称这一故事“系较早的兄弟分家的故事”,“这类故事,能在公元9世纪记录下来,也是十分难得的”⁽³⁾。韦旭升先生认为,李朝时期的小说《兴夫与乐夫》中也有《旁龟》故事的影响⁽⁴⁾。

《旁龟》的故事在早期的文献记载中以帝王传说的形式出现的,而后来在民间长期流传的过程中演变为纯粹的生活故事,并带有明显的伦理教育的因素。如流传韩国、中国朝鲜族民间的《长鼻子哥哥》的故事⁽⁵⁾就是一种典型的道德故事。

《长鼻子哥哥》这一民间故事在韩国广为流传。崔仁鹤先生在他所著《韩国昔话研究》第2部中列举了与这一故事有关的十五种书目⁽⁶⁾。日本学者斧原孝守先生在《魔法金槌》一文中分析了广泛流传于韩国的《长鼻子哥哥》故事之四种变体。这一故事的基本情节如下:

1、有个地方住着兄弟两家,哥哥懒惰,而弟弟勤快。

2、有一天弟弟在山上干活儿的时候掉下来一颗榛子,他捡起它往山上走去。到了晚上看到一座房子,弟弟从房缝往里窥视,看见群鬼正在用一种棒子敲东西叫出了很多金银财宝。弟弟咬碎榛子使其发出声响,群鬼听到声音就吓跑了。弟弟拿着群鬼留下的棒和金银财宝回家,后来成了当地最有名望的长者。

3、哥哥也去山上找到了群鬼的那座房子,趁群鬼吃酒宴之际咬了一下榛子,结果被群鬼发现了。群鬼拿魔棒打他,最后哥哥的个子变成蛇一样又细又长,回到家乡时大家都吓得逃跑了。

除此之外,其他变体中还出现拉长鼻子和拉长性器的故事情节,在此不一一赘述。

类似《长鼻子哥哥》的民间故事在内蒙古地区以《长脖子哥哥》、《宝葫芦》、《如意棒》等故事名广为流传,在内蒙古兴安盟、哲里木盟、赤峰等地这一故事至今仍在流传。兴安盟、哲里木盟等地这一故事以《长脖子哥哥》故事名流传,赤峰市克什克腾一带还流传着拉长生殖器的变体,而在西蒙古卫拉特人中多以《长鼻子弟弟》变体广为流传。这一变体的最初原型见于14至15世纪的蒙古文《喜地呼尔》(一般汉译为《尸语故事》)第14章中,原名为《贪婪的弟弟》,在新疆卫拉特蒙古族中至今仍在流传。《弟弟贪心遭了殃》故事⁽⁷⁾是从《贪婪的弟弟》演变而来的。

流传于东部蒙古地区的《长脖子哥哥》的故事情节更接近于韩国的《长鼻子哥哥》和中国朝鲜族民间故事讲述家金德顺所讲的《长鼻子哥哥》。下面我们看一看流传在科尔沁蒙古地区的《长脖子哥哥》的故事梗概:

1、有兄弟俩人,哥哥富、弟弟穷。因哥嫂经常打骂年幼的弟弟,有一天弟弟生气而离家出走。为了路上充饥,弟弟捡起几颗黄豆(大豆)揣进衣兜就赶路了。

2、弟弟在山林中找到了一座旧窝棚,打算在那儿过夜。到了夜间弟弟听见一群野兽正吵吵闹闹地往窝棚走来,他吓得赶紧爬上了梁。那群野兽走进窝棚,敲起锣叫出了很多好吃的东西。弟弟看见那么多好吃的东西馋得实在忍不住,便从衣兜里掏出一颗黄豆狠劲咬了一口,野兽们听到“咔嚓”一声,丢下锣和魔棒逃跑了。弟弟把宝物拿回家乡,过起了富裕的

生活。

3、有一天嫂子得知弟弟已经发了财，便劝其丈夫去探听弟弟发财的秘诀。弟弟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得到宝物的经过。于是哥哥也往衣兜里揣进几颗黄豆去找那座旧窝棚。夜见听到野兽的声音后爬到梁上等它们进来。野兽们发现了，并拉长了他的脖子。⁽⁸⁾

这一故事与韩国的《长鼻子哥哥》很相似。其中鬼失魔棒、爬到梁上躲避、拉长鼻子等情节基本相同。可见，蒙韩民族间广为流传的这一故事之间可能有某种内在联系，而不仅仅是“不谋而合”的巧合现象。在韩国及中国朝鲜族中这一故事有长鼻子——长个子——长性等不同异文，而在蒙古族民间流传的各种异文中也有长鼻子——长脖子——长性等不同的变体。然而其最早的原型都是“长鼻子”，其他异文都是由此变异而来的。那么，两者之间谁影响谁，哪一个是最早的祖型呢？这一问题比较复杂。从记载于文献的角度来看，韩国的《旁龟》故事早在9世纪的《酉阳杂俎》中就有记载，而蒙古族《长脖子哥哥》的原型最早见于14世纪的《喜地呼尔》。依此推论，韩国的《旁龟》故事似乎是蒙古族《长脖子哥哥》故事的祖型，然而我们还没有找到充分的论据之前只能视其为拟构原型。目前很难断定在《喜地呼尔》之前这一故事是否在蒙古族民间早已流传。从词源上看卫拉特蒙古人中流传的《弟弟贪心遭了殃》中的“白音图”一词与《酉阳杂俎》中的“旁龟”可能有某种关系。究竟“白音图”由“旁龟”演化而来呢？还是“旁龟”由“白音图”音译而来呢？这一问题有待进一步考证。

暂且不论谁先谁后，从其故事类型和情节单元来看可以初步肯定二者同出一源。但任何形式的文学影响都是双向影响过程，这一故事在蒙韩两个民族间长期流传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带上了各自民族的文化色彩。如：在韩国的各种异文中宝物的来源比较固定，都是以“鬼失金银棒”、“丢失的魔槌”为其宝物的唯一来源。而蒙古各地异文中除“鬼失魔棒”外，还有其他宝物来源。如，《弟弟贪心遭了殃》中宝物是由“白胡子”老人那里得到的。在东蒙古地区流传的《宝葫芦》、《如意宝物》等异文中宝物的来源往往是由白胡子老人赐给穷人的，这和蒙古族固有的“白老人”信仰不无关系。在韩国的各种异文中往往以道盖比，以群鬼拉长鼻子或性器官等形式出现，而在蒙古族的各种异文中多以群兽、仙女拉长鼻子或脖子的形式出现。从其思想倾向而言，韩国的各种异文中都有明显的道德教育的倾向，这也许和韩国人的传统的“孝”观念有关。而蒙古各地的异文中着重宣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观念，这和蒙古人的轮回报应等宗教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驴耳汗》与《驴耳王》

在蒙韩民间自古流传着关于《驴耳汗》《驴耳王》的各种变体的民间故事传说。在蒙古族民间，《驴耳汗》故事流传较广，但各地的异文基本一致。在韩民族中自新罗时代就有《驴耳王》的传说，并早已流传。由于流传时间较长，故事情节也变动较大，甚至在中国朝鲜族中故事的名称变异为《马耳朵国王》。

蒙古族《驴耳汗》故事最早见蒙古文《喜地呼尔》（即《尸语故事》），1957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的26章本《喜地呼尔》的第22章收入柏烈伟汉译《蒙古民间故事》中的《驴耳汗》故事。这一故事在蒙古族民间至今仍在广为流传，西起卫拉特蒙古，东至科尔沁、巴尔虎蒙

古部都有这一故事的各种异文。在卫拉特蒙古民间,这一故事往往以复合故事的形式出现,而在科尔沁蒙古地区的《驴耳汗》故事虽然单独流传,但故事情节不完整,后半部分中泄露国王秘密的一系列情节全部欠缺。巴尔虎蒙古中流传的《驴耳汗》故事则比较完整地保留了故事的原貌。

至今在朝鲜族民间广为流传的《马耳朵国王》原型史见于《三国遗事》中的《驴耳王》传说。这一传说是统一新罗时期就流传于民间的关于新罗第四十八代景文王的帝王传说,其故事大意是:

景文王本为花郎,为宪安王的附马,宪安王死,传位于他。传说这位国王性格古怪,即位前很喜欢蛇。每到日暮黄昏时,无数的蛇就聚集到宫中来。宫人惊骇,要把蛇赶走。他却说:“如没这些蛇,我就睡不安稳”。他睡下以后,蛇在他胸脯上爬来爬去。即位以后,一天他的耳朵忽然变长,有如驴耳。王后和宫人都不知道,只有一个专为国王制作头巾的幞头匠知道。幞头匠直到临死前,才敢跑到道林寺的竹林深处无人的地方,对着一片竹子大声喊道:“国王耳朵可长啦!和驴子一样!”

幞头匠死后,每当风吹竹子,竹林中就发出同样的喊声。国王非常狼狈,下令砍去竹子,改种山茱萸。但风吹到山茱萸上,依然发出类似的声音“我们的国王耳朵可长啦!”——只是把“驴子”一词省略而已。

在中国朝鲜族民间,这一帝王传说已逐渐演变成民间讽刺幽默故事,以《马耳朵国王》⁽⁹⁾的故事名长期流传于后世。

蒙韩民间广泛流传的各种异文及中国朝鲜族中流传的《马耳朵国王》都同出一源,这一共同的源就是希腊弥达斯故事。这一故事最早见于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中。⁽¹⁰⁾蒙韩《驴耳王》故事是在欧亚大陆广泛流传的《驴耳汗》故事的东方亚型。以希腊神话中弥达斯王的传说为原型的这一故事是带有世界性的故事类型,国际上通用的AT分类法中的AT782编号就是《国王的耳朵是驴耳朵》这一类型。丁乃通所著《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的第782号也是《米达斯王和驴耳朵》这一故事类型。

弥达斯王的故事传播到东亚的蒙韩两个民族后,又经长期的流传,都经过了一段民族化的过程。正如日本学者斧原孝守先生所说“东亚不容易接受西方的典型民间故事,即使接受,在相当多的场合也是变质的”。⁽¹¹⁾

蒙韩两个民族的《驴耳王》故事在故事的显层方面存在着情节结构相似、基本母题相近等类同性,但在故事的隐层方面,即故事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习俗根基等方面却不尽相同,表现出各自的民族特色和地域文化特征。日本著名民俗学家小岛瓔礼先生在《突厥的驴耳王——围绕〈喜地呼尔〉故事》一文中指出,吃“酸奶干儿”的情节是蒙古族《驴耳汗》故事的副主题,是基于蒙古族传统习俗“同吃母乳者应为兄弟”这种社会习惯的产物,正是这一点体现了蒙古《驴耳汗》故事的民族特色。⁽¹²⁾吃“酸奶干儿”的情节在韩国及中国朝鲜族《驴耳王》和《马耳朵国王》中都没有,却把替王剪发的家奴(蒙古故事中的剃头匠)说成“幞头匠”,我想这是《驴耳王》、《马耳朵国王》故事区别于希腊原型和蒙古亚型的显明特点。韩国人自古戴“高丽帽”,而这种帽子需要附带“头巾”,因此把希腊故事中的“替王剪发的家奴”改换成“为国王制作头巾的幞头匠”是合情合理的。

通过对蒙韩《驴耳汗》、《驴耳王》故事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蒙古族《驴耳汗》故事

更接近韩国《驴耳王》故事这一亚型,而离希腊原型却较远。可见,蒙古人直接从韩国人那里接受这一故事的可能性比较大。韩国《驴耳王》故事可能是希腊故事和蒙古故事之间的过渡性异文。

比较文学研究中非常注重传播媒介影响问题,而地缘媒介则是传播媒介学的核心。两个民族在地域上越接近,其文学间的相互影响越为直接。蒙韩民族间存在着接触性传播的可能性,而蒙古人和希腊人之间只有间接的跳跃性传播的可能性。蒙韩文学间除了地缘传承的影响因素之外,还有战争、贸易、通婚等各种传播媒介,而希腊人和蒙古人之间则这种直接接触的机会甚少。

早在唐代,蒙兀室韦军随征东军打入过朝鲜半岛;自1218年起蒙古军讨伐契丹逃兵进入朝鲜半岛和朝鲜人发生了直接的接触;从元代开始,蒙古与高丽结成“舅甥之国”,从此高丽、蒙古间人物之进出更为频繁,文化间的相互影响较明显,这些历史事实无疑是蒙韩文学间相互影响的重要媒介。蒙韩两个民族几百年来友好交往为其文学交流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民间故事作为一种口头传承文化,更容易通过各种渠道得到迅速的传播,它是一种超越民族界限而广泛传播的文学现象。蒙韩民族间流传的《驴耳汗》、《驴耳王》故事就是民间故事超出民族文化区域界限而相互传播的典型实例。不过,任何民间故事的传播影响都是一个不断再创造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情节移植”。蒙韩《驴耳汗》、《驴耳王》故事虽然同出一源,但经过漫长岁月的流传变异,逐渐演化为具有各自民族特色的两个并存同类故事之亚型。

总之,通过对蒙韩《驴耳王》故事比较,我们可以得出两点共识:(1)同出一源的蒙韩《驴耳汗》、《驴耳王》故事尽管具有同一主题和相同情节,但在不同的地域和文化氛围的流传过程中,又由于彼此间文化背景、思想观念、审美心理的不同,在故事的隐层出现一些差异。(2)尽管《驴耳王》故事由于民族化的过程而产生了带有各自民族文化色彩的变异,但是故事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和叙述方式等显层方面出现了极为相似的特征。这种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现象的出现,是蒙韩两种文化间既吸收又创新的互动影响过程中产生的必然结果。

三、蒙韩其他民间故事间的相互影响

除上述《长鼻子哥哥》、《驴耳王》等故事之外,蒙韩民间故事之间还有不少相互影响的足迹可寻。如:《老虎为啥怕羔恩狙》与《羔狙尔可畏》、《花甲葬的规矩是咋改变的》与《花甲老人》、《亨卜和脑儿卜》与《脚折燕子》、《田螺姑娘》与《画中妻》等都有某种程度的相互影响。《老虎为啥怕羔恩狙》是在东亚地区广为流传的《老虎怕屋漏》故事的一种变体,丁乃通先生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第177条中单独列了《旧屋漏》这一类型。这个故事在我国东北地区的蒙古族、满族等民族中以及韩国、日本国内均有流传。故事讲一只老虎想吃掉一头牲口,正赶上下雨,牲口的主人说了声“不怕老虎就怕屋漏”,正巧小偷一着急从屋子上掉下来,恰好骑在老虎背上,老虎以为这个小偷就是“屋漏”,吓得逃跑了^[13]。笔者认为这一故事的最早原型为蒙古族的《羔狙尔》(又称《羔精害》)故事,韩国的《老虎为啥怕羔恩狙》可能是源于蒙古族《羔狙尔》故事。

蒙古族《羔狙尔》故事的原型见于蒙古文《喜地呼尔》(即《尸语故事》):老虎怕的东

西是“屋漏”，而小偷正好骑上老虎，老虎以为“屋漏”就是他。这个故事在东蒙古地区至今仍在广为流传。科尔沁地区的《羔狙尔》故事就是“屋漏”故事的现代变体，其故事梗概：

1. 有一户人家养了一头驴，有一个下雨天的晚上一只老虎寻食走到那一家的驴圈门口想袭击他们的驴。这时候屋里有两个人正在说话，其中一人说：“这下雨天连老虎都不怕，就怕‘屋漏’”。老虎把‘屋漏’听成了‘羔狙尔’，并暗自寻思这‘屋漏’肯定是个很可怕的动物，要不他们为什么不怕我而就怕它呢？老虎越想越怕，一动不动地站在驴圈门口不敢动。

2. 这时候小偷来偷驴，看见驴圈门口有个黑影，便把老虎当成毛驴骑在上面。老虎把小偷当成了‘羔狙儿’抬腿就往外跑了。老虎越想越怕，越怕越使劲儿跑，小偷起初觉得这毛驴跑得还挺快，等到天亮的时候仔细一看原来骑的是老虎！小偷想尽办法趁早下来，但又想不出合适的办法。又跑了很长时间后小偷看见路边有棵大树就一把抓住了树枝爬了上去。老虎摆脱了“羔狙尔”这才松了一口气，但又怕“盖狙尔”追上来就一个劲儿往前跑去。

3. 路上老虎碰见了野狼。野狼问：“老虎大哥您这是怎么了？”老虎把碰见“羔狙尔”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野狼。听完老虎的话野狼说：“嗨！那不是人吗？我昨天还吃了好几个人呢！跟我来吧，我帮你收拾收拾”。老虎半信半疑不敢动。野狼看出了老虎的心思说：“你不相信我的话咱俩把尾巴结在一起去吧，有什么危险我拉你脱险。”于是狼和虎把尾巴连结在一起去找“羔狙尔”去了。

4. 小偷担心老虎还要回来一直爬在树上不敢下来。他一看见老虎带着野狼来了，吓得尿在裤子里，这时候老虎和野狼已经来到了树下。老虎正要抬头往上看“羔狙尔”的时候从小偷裤腿里漏出来的尿恰巧滴在老虎的脑门儿上，老虎以为“羔狙尔”下来了，拉着野狼拚命往林子里跑。不知跑了多长时间，老虎回头一看，野狼已经列着嘴死了。老虎以为野狼列着嘴讥笑它，便对着狼说了一声“我快要吓死了，你还有心思笑我！”就狠狠地咬断了野狼的尾巴。

韩国民间故事中“羔恩狙”一词，可能由蒙古族民间故事中的“羔狙尔”演化而来的。

“羔恩狙”一词在朝鲜语中不知其本义。可见，“羔恩狙”不是朝鲜语所固有的词汇，蒙古族《羔狙尔》故事传到韩国中被音译成“羔恩狙”的可能性比较大。而这一故事传到日本后却被意译为“旧屋漏”。蒙古族的“羔狙尔”故事是通过朝鲜半岛传入了日本、韩国的《老虎为啥怕羔恩狙》故事可能是蒙古族《羔狙尔》故事东传过程中出现的过渡性异文。

韩民族《花甲葬的规矩是咋改变的》⁽¹⁶⁾和蒙古族《花甲老人》⁽¹⁷⁾都属于习俗传说，这一故事反映了人类的“弃老”到“敬老”习俗变迁史。蒙古族《花甲老人》故事的开头所讲“有一些快到岁数的百姓为了躲避快要临到头上的灾难，都接二连三地逃到外乡去”的情节以及故事结尾部分颁布禁止杀害老年人规矩后，“原先逃到外乡去的老人也都回来了”，“从此百姓安居乐业”等“大团圆”结局，都是《花甲葬的规矩是咋改变的》中所没有的。《花甲老人》中还插进解难题的母题，使这一故事更加符合蒙古族文学传统了。大团圆“结局和出难题考验的母题是贯穿于蒙古族各类民间文学作品中的古老母题类型。花甲老人《这一故事主要流传于赤峰北部牧区，在科尔沁等地的蒙古族中还流传着这一故事的其他异文。如：科尔沁地区的异文中讲道：很早以前，有老人到六十岁必须活埋的规矩。有一个年轻人背着到了六十岁的老母去山上埋葬的途中，老母一路上不断折断树枝往后扔，年轻人很奇怪地问：“这是干什么？”老母说：“以防你回家的途中迷路”，年轻人听了以后特别感动，受良心的谴责又把老母背回家，违背旧规矩偷偷地供养老母多年，从此大家也学起这位年轻

人,不把老人活埋了。

在历史上,有些民族中的确存在过弃老的社会习俗,象印度、日本、韩国等都有这一古老习俗的历史痕迹。而蒙古文献中却找不出有关这一习俗的记载。可见,蒙古地区《花甲老人》故事是从其他民族中传来的外来故事。那么,它是通过哪些途径传到蒙古地区的呢?有一种可能是随着佛教的传播从印度——西藏——中原这一条陆路传播路线传到东北蒙古族地区;另一种可能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从印度——日本——朝鲜半岛这一条水路传播路线传到蒙古地区。笔者认为后一种可能性较大。因为蒙古《花甲老人》故事的各种异文主要流传在靠近辽东、朝鲜半岛的科尔沁以及赤峰北部地区。而通过风俗习惯之溯源可以发现,日本、韩国、中国东北等东北亚地区正是古代弃老习俗流行地区之一。

总之,我们通过追源溯流等方法可以弄清蒙韩民族间流传的同类故事之渊源关系和相互影响的媒介和途径。帮助我们解决很多同类故事的真正族属问题,如韩国《亨卜和脑儿卜》故事不仅和蒙古族《希望落空的姑娘》、《脚折燕子》等故事情节相似,而且也发现名字同一些民族的互相影响。如:“脑儿卜”一词既象蒙古人的名字,也象藏语“诺尔卜”,通过如此多故事的追源溯流和分析后,可以断定很多故事的源与流、原型与亚型问题。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超出一个故事、一个情节单元的微观影响比较,在更宽广的背景上开展宏观的影响比较,对蒙韩民间文学之间的历史关系以及相互影响的基本模式等问题有个整体上的把握,这样更有助于对其进行更系统、更全面、更深刻的比较研究。

注释:

(1) 赵成日:《略论朝鲜族民间故事》,见《朝鲜族民间故事选》第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2)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第199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3) 张紫晨:《中国民俗学史》第231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1月版。

(4) 韦旭升:《朝鲜文学史》第15、1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10月版。

(5) (14) (16) 《金德顺故事集》第136、406、6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6月版。

(6) 崔仁鹤:《韩国昔话研究》,弘文堂1976年版。

(7) 郝苏民:《西蒙古——卫拉特传

说故事集》第426、429页,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3月版。

(8) (15) 根据笔者记忆整理。

(9) 《朝鲜族民间故事选》第25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10) 《变形记》第14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11) 日本《比较民俗学会报》,1992年第13卷第4号(通卷79),第3页。

(12) 日本《比较民俗学会报》,1988年9卷第3号(通卷36),第3页。

(13) 《民族文学研究》,1993年第4期。

(17) 《蒙古族民间故事选》第15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5月版。

(责任编辑 秀蜀)